

龍川詞校集

龍川詞校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重印說明

本書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由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毛邊紙綫裝本，這次重排再版，整理著作了較多修改補充。

龍川詞校箋

(宋)陳亮著

夏承焘校箋 軒家寬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.125 字數54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22,5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318 定價：(七)0.82元

論陳亮的《龍川詞》（代序）

陳亮（一一四三——一九四年）字同甫，號龍川，浙江永康人。是南宋的哲學家、政論家、詞家。他提倡事功，在當時的「浙東學派」裏自成一個體系，稱為「永康學派」。他自負其文是：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開拓萬古之心胸。」（見寄給朱熹的信）他很少作詩，却有四卷長短句詞。今傳《龍川詞》一卷，僅三十首，加以後人補輯的，一共也只有七十多首。他對於詞，有其不同于當時一般詞人的看法和作法。這裏談談他結合政治議論的作品。我認為，他這一部分詞應該是宋詞裏佔價很高的作品，在文學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。可是歷來撰文學史的不曾注意到它，有的在論宋詞的章節裏並且沒有提到《龍川詞》。

陳亮有一位很摯密的學侶葉適（一一五〇——一二二三年，永嘉人，南宋「浙東學派」領袖之一），在陳亮死後，為他作了一篇《書龍川集後》，中間有這樣幾句話：「（亮）有長短句四卷，每一章就，輒自嘆曰：『平生經濟之懷，略已陳矣！』余所謂『微言』多此類也。」這裏所說的「微言」，在葉適為陳亮作的文章裏屢次提到，另一次見于他的《龍川文集序》：「同甫微言，十不能解一二。」又一次見于他的《祭陳同甫文》：「子有微言，余何遽知！」意思都是說陳亮平生的言論在

他看來有許多是不大可了解的；對陳亮論詞的話，也同樣使他有「不能解」的感覺。其實，葉適這樣懷疑陳亮的論詞，是並不足怪的。我們知道，詞在南宋時，固然已經不復是晚唐五代「花間派」娛賓遣興之作；但《花間》的影響在那時還不會淘洗淨盡。有些人還認為詞只可以抒寫個人的閑情幽怨，有些人把它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餘技小道；葉適就是後一種人。而陳亮却說他自己的詞裏有「平生經濟之懷」，這是當時一般詞人的作品裏所不會有過的內容，在葉適聽來自然是「不能解」的「微言」了。南宋陳振孫作《直齋書錄解題·龍川集》下，也說：「《外集》皆長短句，極不工，而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，尤不可曉。」可是陳亮的詞却是因爲有了這些內容而獨具特色，突出於當時的詞壇。

陳亮詞這種作風，不僅葉適不會了解，一般婉約派詞家不肯嘗試，就是他的前輩張元幹、張孝祥諸詞人以及與他志同道合的大詞家辛棄疾，也不會這樣做過。我們知道，南北宋之交，張元幹、張孝祥等人曾經拿詞這種文學作為向投降派抗爭的政治武器，可是他們沒有把政治議論寫進詞裏去。辛棄疾早年作《美芹十論》及《九議》，和陳亮的《中興論》、《上孝宗皇帝書》是同類的救亡抗敵的大議論，但在他的《稼軒詞》裏却看不出《十論》、《九議》的議論。以我所知，在宋代詞家裏，能够自覺地這樣做，而且做得這樣出色——內容是政治，寫出的却不是政治語匯的堆砌，這就只有陳亮一人，只有他的《龍川詞》裏有這一部分作品。

陳亮的詞被後人歸入「蘇、辛詞派」。他和辛棄疾都是始終主張恢復，反對向敵人投降的民族志士，他們的詞無疑是互相影響、互相啟發的。陳亮寫這類結合政治議論的詞篇有幾首《賀新郎》，就是和辛棄疾互相酬唱的作品。我們論陳亮的詞風，就可以從這幾首《賀新郎》說起。這裏要先敍述一件他二人共同策劃恢復大計的政治行動，這就是這幾首《賀新郎》的歷史背景和創作動機。

陳亮在孝宗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）作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，鼓勵孝宗應該掌握「今日大有爲之機，不可苟安以玩歲月」。淳熙十四年（一一八七）十月，那個患恐敵病的八十老人宋高宗趙構死了，陳亮以為這是鼓舞宋孝宗進行北伐的好機會。次年四月他《上孝宗書》說：「高宗皇帝春秋既高，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，抑心俯首，以致色養。……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，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瞻陛下之舉動。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，一旦而復索然乎？」他在上書孝宗之後，還離家往金陵、京口兩處觀察軍事地形，又往江西上饒訪辛棄疾，并寫信約朱熹來共商恢復大計，這就是辛、陳兩家詞裏所謂「鵝湖之會」。朱熹當時並沒有來赴約，他後來答陳亮的信說：「奉告老兄，且莫相攬掇，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。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杰，韞經綸事業作不得、只恁麼死了底何限；顧此腐儒，又何足爲輕重。」依這種語氣看來，他好像是有意不來參加的。也許因為他比較那些在野的人多知道一些朝廷裏的氣候，他這時已

經預感到恢復之事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！」所以陳亮這次政治策劃，雖然得到辛棄疾的熱情支持，結果仍是全盤落空；只留得兩家幾首激昂慷慨的唱和詞傳誦至今，引起後人無限同情。

「鵝湖之會」的次年，陳亮就以被誣殺人罪又一次下獄；這次獄事，據記載說是由于一個鄉人名呂天濟的被人打死而引起的。但陳亮在出獄之後寫給各交游的謝啓，屢次提起「當路見憎」的話，可見這次冤獄的原因相當複雜。《宋史》本傳記他在淳熙十五年上書之後，「在廷交怒，以爲狂怪」。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引起當權派的不滿，很可能與這次冤獄有關。

我們談了他這次政治行動的經過，再來讀他在「鵝湖之會」前後所作的幾首詞篇，看看他是怎樣將「經濟之懷」融合入詞的。

念奴嬌 登多景樓

危樓還望，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？鬼設神施，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。一水橫陳，連岡三面，做出爭雄勢。六朝何事，只成門戶私計！因笑王謝諸人，登高懷遠，也學英雄涕！憑却江山，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。正好長驅，不須反顧，尋取中流誓。小兒破賊，勢成寧問僵對！

這首詞作于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，在「鵝湖之會」的前數月）往金陵，京口看察軍事地形的時候（多景樓在京口）。《宋史》本傳：「高宗崩，金遣使來弔，簡慢。……亮感孝宗之知，至金陵視形勢，復上疏云云。」上疏裏說自己看察之後，才知道古今論這兩處形勢的都未能深識天地設險之意。「京口連岡三面，而大江橫陳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，而非若穴之藏虎」，就是說其勢宜于進取，而不宜于退守，天意決不是要以這條大江劃分南北，使南人自限南方一隅，自外于一統的中國的。又說：從東晉以來，經歷六朝到隋代，南北分裂三百多年，但是「南師之謀北不知凡幾」，還總是要恢復北方故土，「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，以南方爲可憂，一日不和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」。這篇議論和這首詞正是大意相同。

「鵝湖會」後，陳亮別辛棄疾歸永康。辛棄疾作《賀新郎》詞寄陳亮，詞中稱贊陳亮：「看淵明、風流酷似，臥龍諸葛。」敍這次聚會的心情：「剩水殘山無態度，被疏梅料理成風月。兩三雁，也蕭瑟！」末了抒寫對國事的慨嘆：「鑄就而今相思錯，料當初費盡人間鐵。長夜笛，莫吹裂！」他二人用這個《賀新郎》調子共唱和了兩三次。

陳亮第一首和詞說：

老去憑誰說？看幾番、神奇臭腐，夏裘冬葛。父老長安今餘幾？後死無讐可雪；猶未燥當時生髮。二十五弦多少恨，算世間那有平分月？胡婦弄，漢宮瑟！

樹猶如此堪重別！只使君從來與我，話頭多

合。行矣置之何足問，誰換妍皮癡骨？但莫使伯牙弦絕！九轉丹砂牢拾取，管精金只是尋常鐵。龍共虎，應聲裂。

這詞上片「父老長安今餘幾……猶未燥當時生髮」幾句，是用北魏拓跋燾的話。陳亮在《中興論》裏也曾經引用這個故事，并寫出和這詞同樣的感慨：北方淪陷已經五十多年了，中原父老相繼老死，後生出世于北方統治之下，也就認人作父，忘了故主。南北朝時，宋文帝北伐，向北魏索取河南故地；魏主拓跋燾說：「我從出世胎髮未燥時，即知河南是我境土，那得說是南朝故地！」現在的情況也正如此；若再放過了現在這段時期，不急圖恢復，事過境遷，北方百姓又知我是誰！這首詞就是概括了《中興論》這段話的內容。第二首和詞說：

離亂從頭說，愛吾民、金繪不愛，蔓藤纏葛。壯氣盡消人脆好，冠蓋陰山觀雪，虧殺我一星星髮！涕出女吳成倒轉，問魯爲齊弱何年月？丘也幸，由之瑟。斬新換出旗麾別，把當時一樁大義，拆開收合。據地一呼吾往矣，萬里搖肢動骨。這話霸只成癡絕！天地洪爐誰扇鞴，算子中安得長堅鐵？淝水破，關東裂。

「壯氣盡消人脆好」數句，有他的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中一段話可作印證。上書主張遷都建業，說錢塘一隅之地，秦檜因爲要固定他的求和政策，在這裏大興土木，制禮作樂，來粉飾承平，風俗便日趨奢靡。官僚們又在這裏造園囿臺榭，作偷生享樂的打算。掌握朝廷大權的多是江浙閩蜀一班平凡的人才。「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，用閩浙日衰之士，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

衆北向以爭中原，臣是以知其難也！」這些話是對當時南方官僚集團尖銳的指斥。紹興、乾道年間，有個小官僚曾協著了一部《雲莊集》，中有一篇題名《賓對》的文章，大旨是說安享太平為渾穆之王風，恢復中原為戰爭之霸術。這足以代表當時投降派的謬論，也正是陳亮在政論和詞篇中所指斥的對象。

陳亮還有一首《水調歌頭·送章德茂大卿使虜》詞，後來編為《龍川詞》的壓卷第一首：

不見南師久，謾說北羣空！當場隻手，畢竟還我萬夫雄。自笑堂堂漢使，得似洋洋河水，依舊只流東？且復穹廬拜，會向藁街逢。
堯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，于中應有，一個半個恥臣戎！萬里腥膻如許，千古英靈安在，磅礴幾時通？胡運何須問，赫日自當中！

這是「鵝湖之會」的前四年（一一八四）送章森出使金國賀正旦之作。《龍川文集》（十九）有《與章德茂侍郎》幾封信說：從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南侵，至今將近三十年，從乾道元年向金稱姪求和，至今又二十三年，目前文恬武嬉，都作永久偷安之計，但依時勢看來，恐怕必不可。又說：主上有意北伐，而臣下沒有能够擔當大任的人，這是士大夫的羞恥，國人能知道這羞恥的人實在太少了！他在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裏也說：「南師之不出，于今幾年矣，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鬱而不得泄，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杰之能自奮哉？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。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，必將有承之者矣。」《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》作于這詞之前五六年，而書、詞議

論相同，可知他在這幾個年頭裏「念茲在茲」的心情。

陳亮表達其愛國思想的詞不僅這幾首，但這幾首詞最能見出他熱烈激越的感情，也最能說明他的詞是怎樣結合他的政治議論的。本來，陳亮這些政治議論都是明見于他的著作裏的，可是從來不曾有人把它列舉出來和他的詞篇對讀。他的好友葉適也不會這樣做，所以會將陳亮的「自嘆」認為是「不能解」的「微言」。陳亮既已以這種種議論寫為奏議、為書函、為論著，而又以之入詞。有的既已入詞，而又以之為奏議、為書函、為論著。這樣不厭重言累語，正由于他自負「經濟之懷」，不能默焉自己。這是他愛國熱情的表現，決不是有意要以文字見異于人，如世所謂「以詩為詞」、「以論為詞」的文人見識。我們知道，宋元人也有以政治語匯入詞的，如徐鹿卿的《水調歌頭·賀史宰受薦》（見《彊村叢書》本《徐清正公詞》），陸文圭的《金縷曲·代送同僚》（見四印齋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詞》本《檣東詩餘》），那些都是庸俗的應酬惡札，讀來使人失笑。我們讀陳亮的《念奴嬌》：「憑却江山，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。正好長驅，不須反顧，尋取中流誓。」讀他的《賀新郎》：「父老長安今餘幾，後死無讐可雪，猶未燥當時生髮。」尤其是送章德茂使金的《水調歌頭》：「堯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，就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！」這般噴吐迸發的熱情，激越高昂的聲調，在整部唐宋詞裏，表達愛國赤誠的作品，可以跟它并比的能有幾何？我們讀陳亮這些詞，雖然知道這和他的《上孝宗皇帝書》、《中興論》等等議論完全相同，但當我們被

這些詞的思想感情所吸引時，又何暇問它哪些像政論，哪些像散文，只覺其光耀眼，其熱炙手，一團愛國赤誠而已，尋常吟人詞客，哪能辦此！

我們讀了陳亮這些政論詞，在研究他的思想感情根源之前，還得先談談他的詞和政論的風格，試分三點來說：

(一) 先拿他的詞和辛棄疾的詞相比。陳亮和辛棄疾在政治主張上是同道，論政治遭遇，又是被排擠被迫害的同病相憐者，因此他二人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很相似，尤其是「鵝湖會」後幾首唱和的《賀新郎》詞。但是二人的詞風還是同中有異：辛棄疾的詞，最激烈高昂的，也只能是「起望衣冠神州路，白日銷殘戰骨，嘆夷甫諸人清絕！」他有許多鬱怒不平，只能託之兒女愛情（如《摸魚兒》：「更能消幾番風雨」），託之夢寐（如《蘭陵王》：「恨之極」），託之山水、懷古（如《賀新郎》：「甚矣吾衰矣」；《水龍吟》：「老來曾識淵明」）等等。而陳亮的詞却都是明指直斥，無所顧忌，這是他和辛詞同中之異。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二人政治地位不相同。趙宋王朝立國之初，就鑒于唐末軍人跋扈之弊，對有軍事才能的臣下曲加防範。在南宋，對從北方來投的「歸正軍民」尤其懷疑猜忌。辛棄疾是北方「歸正」人物，又有軍事才能，因此屢遭南方官僚的彈劾打擊。他在這種憂讒畏譏的處境下，只得摧剛爲柔，這點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。陳亮則不然，他是一介布衣（五十歲以後才狀元及第），因爲沒有政治地位，就少了種種顧忌，便敢明目張膽，高言

大語。他極恨南方民氣銷沉，士大夫萎靡退縮，不敢挺身負責。所以他無論上疏論事，或與當權官員通函論政，總是侃侃堂堂，不屈不撓。他的詞風雄肆激昂，和他的政論的風格是一致的。

(二)他論恢復，也和南宋一般人反投降倡北伐的議論不盡相同。他所指斥的矛頭，不限于那批向敵人屈膝求和的庸才，并且不放過那些所謂「才臣」。他說：「今世之才臣，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，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，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，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？」(《上孝宗皇帝書》)這裏面就包括孝宗初年符離之役中那班僨事之徒。他又指責當時學術界逃避現實的風氣：「今世之儒士，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，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。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，而方低眉拱手以談性命，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？」他上書斥當時主張講和的人是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，而爲妄庸兩售之地」。他指出「妄」、「庸」兩種人是決不能成恢復之大業的；擔當天下大任的，必須有不拘繩墨文法的「度外之士」，這正是被秦檜以來那批投降主和派所排擠攘斥的人物；陳亮就自負是這類人物。他自贊爲「人中之龍，文中之虎」。早年著《三國紀年》，很仰慕陳登之爲人。有這種風格的人，發爲議論自然是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開拓萬古之心胸」；表現在詞裏，也自然是一片光明俊偉、磊磊落落的氣象。

(三)當他第一次上書，孝宗見了，「赫然震動，欲榜朝堂，以勵羣臣，用種放故事，召令上殿，將擢用之」。一位官僚曾覲揣摩了皇帝的意旨，就去求見陳亮，「亮恥之，逾垣而逃」。第二次上

書，「帝欲官之，亮笑曰：我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，寧用以博一官乎？亟渡江而歸。」（都見《宋史》本傳）這可見他一片爲國赤誠，并不追求功名利祿，所以會理直氣壯地發言，理直氣壯地寫文章填詞。

陳亮這種政論風格、創作風格的根源，是他的政治態度和社會生活實踐。

他出生于浙東農村中一個沒落地主的家庭，先世沒有一個顯赫的人物。他中年以後雖然交結了許多當代賢達，但因爲屢試下第，總得不到政治地位。又因爲上書放言高論，招致當權者的忌恨，屢次被誣下獄，他的老年父親也時常被鄉人所凌辱，可見他在當時的統治集團裏是被排擠的人物。在他家族歷史上，他的曾祖陳知元在金人南侵時從軍抗敵，以身殉國，這無疑對他會產生深刻的影響，加上他本身在政治上被排擠受打擊種種不幸的遭遇，都使他加深對政治現實的認識。當他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）上書失意歸家時，在答呂祖謙的一封信中說：……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，既不可得，方欲別開營生，又恐他時收拾不上；方欲出耕于空曠之野，又恐無退後一着；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，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；方欲懷酒叫呼以自別于士君子之外，又自覺老醜不應拍。每念及此，或推案大呼，或悲淚填臆，或髮上衝冠，或拊掌大笑。今而後知克己之功，喜怒哀樂之中節，要非聖人不能爲也。……然一夫之憂憤悲樂，在天地間，去蚊虻之聲無幾，本無足云者，要不敢不列于知我者之前耳。」他這般詳細描畫自己憤慨侘

僚的情狀，並不是完全出于個人得失的計較。他作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》敍述當時科舉冗濫的情狀：「場屋之士以十萬數，而文墨稍異，已足稱雄于其間矣。」而他自己要借一第以施展其經濟抱負，竟數十年不得如其願。這般不合理的政治現實，哪能不使志士們扼腕拊膺！

符離戰敗之後，一二十年來，南宋苟安疲塌的朝局，學術界逃避現實的學風，官場上種種卑鄙無恥的醜態，都引起陳亮反抗不滿的情緒，如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尤其使他痛心疾首的，是當時士大夫間流行一種「偏安定命論」，說「南北有定勢，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」。陳亮在逝世的前一年，當光宗策問進士時，在對策的開頭，他就大聲疾呼：「天下大勢之所趨，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易之者人也！」這是震撼人心的警語，在後世猶有振聾發聩之效，何況當時！那年他參加瓊林宴，和光宗賜詩，也說：「復仇自是平生志，勿謂儒臣鬢髮蒼。」這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。

他通過困厄拂逆的政治遭遇和社會實踐，提高對時代現實的認識，因而使他迸發不可壓抑的愛國熱情，使他的學術思想和文學創作都能密切結合當時的政治。他希望發揮自己的精力才智，對社會國家有所建樹。這是他「功利哲學」的思想基礎，也是他文學創作的思想基礎。

他以詞篇抒寫自己「平生經濟之懷」，使這種幾百年來在文人手中長久脫離現實的文學，能在當時政治上發揮一定的作用，在文壇上別開境界，放射它未曾有過的光芒，這決不是偶然的。

陳亮有《與鄭景元提幹書》一篇（景元即鄭伯英，永嘉學者），提及他自己是怎樣作詞的：「閑居無用心處，却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，以創見于後來。本之以方言俚語，雜之以街談巷歌，博採義理，劫剝經傳，而卒歸之曲子之律，可以奉百世英豪一笑；顧于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。」這百字左右的自述原是研究陳亮詞難得的材料。但嫌偏重于文學形式方面，論價值，却不及葉適所述「平生經濟之懷，略已陳矣」十個字，這十個字才是陳亮詞精髓所在。若離開這方面來看《龍川詞》，它還是有不少缺點和局限性的。如有許多投贈祝壽之作（《阮郎歸·壽外舅》等），有狹邪艷體（《念奴嬌·至金陵》一首是贈妓的），又不免花草閑題（如《點絳脣·詠梅月》等等）。這只是就他的《龍川詞》三十首而言，若毛晉、王鵬運兩家所刊的《補遺》，此等尤多；這都是陳詞的糟粕，大概是陳亮自己要刪棄的東西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些婉約綺麗之篇，如見于黃昇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的《水龍吟》「鬧花深處層樓」、《洞仙歌》「瑣窗秋暮」、《虞美人》「東風蕩漾輕雲縷」等，就藝術說，原有其一定價值。但是使龍川在兩宋詞壇上能佔突出的地位的，決不是由于這些作品。而黃昇諸人却專選這一類，這正如元好問論詞絕句所說：「少陵自有連城璧，爭奈微之識珷玞！」

宋末詞人張炎著《詞源》，譏辛棄疾「作豪氣詞，非雅詞也」。張炎是形式主義的沒落貴族作家，他發這種謬論，原無足怪。陳亮詞比辛詞更豪放橫肆，自然更不會爲形式主義的文人所欣

賞。清人作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于《龍川詞》下引《花菴詞選》所選陳亮詞，說他多纖麗之作，并引用周密《齊東野語》所記陳亮因戀台州官妓致使唐仲友與朱熹交惡的傳說，意在誣譖其人品。封建文人說理學既偏袒朱熹而貶陳亮，對他的詞自然不可能有好評。歷來有識見的學者能推重陳亮的原也不少，但似乎未曾有人注意到拿《龍川文集》裏的政治議論來對讀他的《龍川詞》，因此不易了解他「經濟之懷略已陳矣」的真意，或者也許會相信葉適「微言」之說，而疑陳亮的自述是不可盡信的夸談。為此，對陳亮詞作些疏通證明是有必要的。這樣做，不僅僅爲了要讀懂陳亮一家之詞，更重要的是，通過對陳亮詞的研究我們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宋詞辛、陳一派是怎樣反映當時的民族矛盾的，了解這種文字只有結合當時的政治、爲政治服務，才能進一步提高和發展。《龍川詞》就這樣奠定了陳亮在詞史上的地位。

夏承熹

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二日——廿五日，杭州

陳亮傳

〔明〕李贊

陳亮字同甫，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，爲人才氣超邁，喜談兵，論議風生，下筆數千言立就。嘗著《酌古論》，郡守周葵得之曰：「他日國士也！」及葵執政，朝士白事，必指令揖亮。因得交，一時豪俊。隆興初，與金人約和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；獨亮持不可，因上《中興五論》，奏入，不報。亮圍視錢塘，喟然歎曰：「城可灌爾！」蓋以地下於西湖也。淳熙五年，孝宗卽位，又十七年矣。亮更名同，復詣闕上書。書奏，孝宗赫然震動，欲榜朝堂，用種放故事，召令上殿，將擢用之。左右大臣惡其直言，遂有都堂審察之命。亮待命十日，再詣闕上書。帝欲官之，亮笑曰：「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，寧用以博一官乎？」遂渡江而歸。日與邑之狂士飲，醉中戲爲大言，有欲中亮者，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。澹嘗爲考試官，黜亮，亮不平，語數侵澹，澹聞而嫌之，即繳狀以聞，事下大理，笞掠亮無完膚。孝宗知爲亮，及奏入取旨，帝曰：「秀才醉後妄言，何罪之有！」割其牘於地。亮遂得免。居無何，亮家僮殺人，適被殺者嘗辱亮父，其家疑事繇亮，聞於官。乃囚亮父子州獄，而屬臺官論亮情重，下大理。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，而辛棄疾、羅點素高亮才，援之尤力，復得不死。亮自以屢遭大獄，歸家讀書，所學益博。嘗曰：「研窮義理之精微，辨析古今之同異，原